

日本军事 崛起之路

幕末至明治时代 ● 潘越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指文

指文® 战争事典 特辑 005

日本军事 崛起之路

幕末至明治时代 ● 潘越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军事崛起之路：战争事典：幕末至明治时代 /
潘越著.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107-0842-8

I. ①日… II. ①潘… III. ①军事史-日本-19世纪
~20世纪 IV. ①E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732号

日本军事崛起之路：幕末至明治时代

潘越 著

策划制作：指文图书®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版本：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978-7-5107-0842-8

定价：5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001

序

004

第一章 江户日本

022

第二章 打开国门

040

第三章 内忧外患

074

第四章 萨长联手

104

第五章 倒幕战争

138

第六章 走向扩张

170

第七章 冉冉升起

200

第八章 十年磨刀

232

第九章 一战功成

272

第十章 远去的荣光

308

后记



序

一幅生动的日本近代军事变革图景

众所周知，从江户幕府到明治时代，整个日本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其中军事领域的改革尤其引人注目。这也是作者此书所要着力展现给读者的主体内容。

江户幕府实行的是以藩国为基础的武士集团军事体制，其长期保持稳定的前提是地方各藩大名对幕府的效忠。但由于江户幕府创立者德川氏与各“外样大名”之间从战国时代开始就已积累起了宿怨，而此宿怨并未因幕府的建立和外样大名们对其宣誓效忠而真正消解，到了幕末外来冲击不断加剧的情况下，那些心中早已满怀怨气的地方大名们便开始蠢蠢欲动了。了解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对于真正掌握此后诸番变动的背景和原因是必须的，这也是潘先生此书花了大量篇幅介绍战国以来日本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的理由所在。

在上述那些蠢蠢欲动的外样大名中，当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最为突出，而这其中又以萨、长二藩的影响和作用更为巨大。如果能抓住这两大藩及其相关人事脉络则大抵即可认为已经理解了一半的幕末和明治史，尤其是军事史。这不仅因为正是这两大藩出人出力一担两肩挑起了推翻江户幕府的重任，也不仅因为近代那些著名的军人和政治家大都来自这两藩，更重要的是，日本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绝无仅有的那种近代陆海军制度就来源于这两大藩之间的恩怨情仇。明治大正之间曾有人著书《萨之海军，长之陆军》，明确了这一渊源和传承关系，更有人深刻地指出：海军与三菱、陆军与三井各自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于是就形成了所谓“萨—海—三菱 VS 长—陆—三井”这一政军财三阀双巨头的对抗图景。这一概括虽不全面，但也基本揭示了幕末明治时期日本军事体制变革的内在机制。除此之外，天皇制、现代师团制以及海军建设等都是日本近代以来军事制度变革的重要方面，作者在书中也对此结合具体史实进行了充分阐述。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在潘先生对幕末明治时期历次重要战争的叙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对于这些战争的描述，作者并不单单停留于叙述一般战役过程及相关人物、装备及参战军队序列等战争本身的诸要素，而是在对整个战争的政治、经济及外交背景作充分交代的基础上展开叙事的。这一叙事过程甚至已脱出了日本的一隅之地，更多地放到了当时整个世界大势中去考察，而在此过程中作者更是把同期中国的历史作为参照进行了比对。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之下，我们对战争的了解变得更加立体、更加全面，而战争本身也变得更加生动、更为形象了起来。

非但如此，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对客观历史的简单陈述，在书中的许多地方，他都不惜笔墨地抒发自己对各类问题的看法。从中不难看出他对西南战争中西乡隆盛的百般怜惜，更不难看出他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千种遗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细节的精到之处更是令人拍案，此处仅举其中一处。

在谈到长州藩抵抗外国舰队入侵的下关战争时，作者有这样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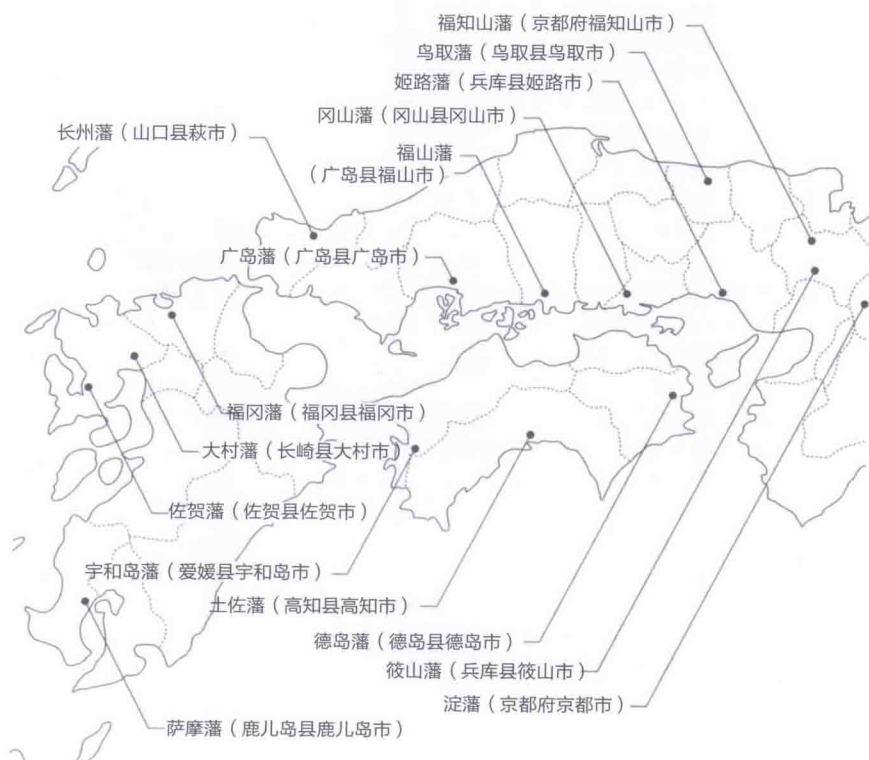
“与长州藩隔海峡相望的北九州小仓藩武士及百姓袖手旁观，令长州藩无比气愤，以至于战后向幕府提出控诉。而长州藩自己的百姓呢？他们也只是登高观战，见武士们被打跑了，便向登陆的西洋水兵端茶送水，然后帮助对方搬运战利品——火炮，完全是一副长州藩遭攻击如同他人之事的态度（出自木村时夫所著的《日本民族主义史论》）。今日看来不禁令人莞尔。这些事实，能说明外国军队对两藩的攻击（两藩政权主导者日后成为了明治政府首脑）是‘民主的惩罚’吗？”

潘君此书我已细读过，希望日本军事史、日本近代史乃至日本史的爱好书也都来仔细读一下。同时期待潘君在日本史研究方面更上层楼，也祝他有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是为序。

日本史研究专家 张轶
于甲午闰九月廿七

日本幕末时代主要藩国、藩政厅(政治中心)所在地及现在的对应地名





第一章
江戸日本



日光东照宫（栃木县）的阳明门。日光东照宫为祭祀德川家康的神社

江户开启

德川家康，出生于1543年，是三河国（现爱知县东部）松平家的小大名，于1603年（庆长八年）出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此时，家康年六十，在那个遍地战火的时代已算长寿之人。他人生中曾多次面临生死绝境，但都以大毅力坚持下来，即使曾在三方原合战中惨败武田信玄之手，仅以身免，但最终率领东军赢得关原合战（1600年），奠定了两个半世纪有余的江户幕府基业。1614—1615年，家康通过大阪冬、夏两次合战消灭了丰臣家主力，总算给战国乱世画上了句号。



◎ 1572年三方原合战之后，德川家康令人给自己绘制了这幅肖像。画中，家康一脸惊惧愁苦，显然是为了警示自己吸取教训

被德川家康夺去天下的丰臣家，却又是丰臣秀吉趁其主君织田家突遭大变（公元1582年本能寺之变）时崛起的。秀吉出身微贱，一生改过好多次名姓，只为博一个出人头地，还曾在织田信长手下负责后勤经营（有一个脍炙人口的传说：他的第一份工作只是给信长提鞋）。秀吉受到快速提拔并不是因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将才，而是因他特别善于统制庞大的人力、财力突击实施战地工程。无论是快速建造城池，还是快速修建堤坝去堵水淹没敌方城池，他这方面的本事在战国时代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丰臣秀吉基本压服北至陆奥、南至九州的全各地大名后，营造了宏大的大阪城作为政权中枢，生活极其奢靡。相反，被从老家三河国打发去关东的德川家康则泥足插土，苦心开拓江户城。这两位风云人物的反差，实质代表了日本未来的两条不同发展道路。丰臣秀吉的事业直接继承自织田信长，而信长的崛起得益于许多划时代的政策：兵农分离，建设城下町为主的重商主义，积极引进西洋热兵器并据此改革作战战术。这些激进的政策必然导致信长与旧有社会势力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对此信长的回应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天下布武。说得粗俗点就是谁不服就杀谁，无论男女老幼。这是信长经常搞大屠杀而被天下指为“第六天魔王”，并在本能寺被明智光秀作乱谋害的背景所在。

对一个近似草莽的重商主义政权来说，战争和杀戮可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还是必



◎ 正在烧伤抢掠的倭寇。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倭寇往往穿着武士甲冑，但现实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倭寇中的日本人主要来自沿海岛民，穿着破烂，形同恶鬼

流窜，烧杀抢掠，这便是“倭寇”。明朝军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平定倭患，但倭寇的表现已经激起了丰臣秀吉的欲望。他两度发动大军登陆朝鲜，妄图以此为跳板席卷大明。

事实证明，织田—丰臣一系的商业化、技术化革新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天下布武”局限于日本国内尚可，吞并海外实属白日做梦。自明军的辽东精锐部队入朝后，侵朝日军便节节败退，龟缩于朝鲜半岛南端。日军的船队更是连连惨败，其安宅船大而无用，远不及朝鲜军队装备的龟船。侵略战成了消耗战，秀吉最终忧愁而死，随后日军仓皇撤回国内。在侵朝战争中日本西部大名损失惨重，而立足关东，持隐忍、观望态度的德川家康终于觅得良机，运筹帷幄数年，发动关原合战，一举夺取天下。

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在江户创设的幕府，是日本武士政权自镰仓幕府以来的终极形态，也是日本封建制度的巅峰形态。封建封建，封土建国是也。日本古代大和朝廷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隋唐的制度、文化、习俗等，并在国内大力推广。然而，日本贵族们演绎未央宫的风花雪月是一回事，在一个遍布崎岖山脉、严重缺乏耕地的岛国生硬套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体制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快，朝廷在各地任命的“国守护”沦为摆设，所

谓的“在地武士团”逐渐做大并拉帮结派，导致势力最大的源氏集团和平氏集团进行争霸战争，获胜的源赖朝建立了镰仓幕府。但武士集团掌权归掌权，要真正登堂入室，学会如何治理国家，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

此后日本又发生了南北朝战争，室町幕府取代镰仓幕府，并试图用“将军”坐镇京都近畿、“关东公方”坐镇关东这一双管齐下的体制来解决问题。其意图好似在一支



◎ 北条早云的晚年画像。“早云”是他出家之后的法号，而“北条”姓氏则是他强拉与镰仓幕府执政北条家之间关系得到的，史家只能称其家族为“后北条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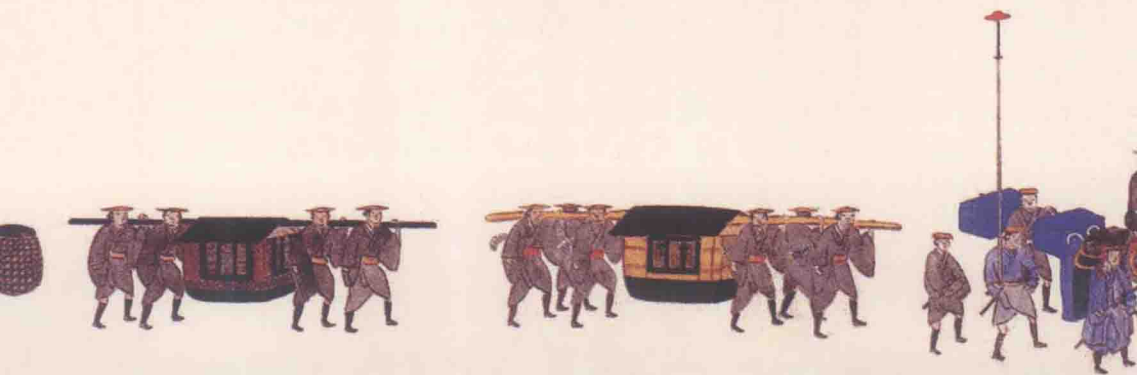
管弦乐队里增加几个指挥，各管各的声部，这非但没有让乐曲和谐起来，反而是敲锣打鼓自吵不休。南北朝的对抗到14世纪末才偃旗息鼓，仅仅几十年后的1467年日本便因将军的继承问题发生了“应仁之乱”，朝廷、幕府的权威与繁华京都一道荡然无存，战国时代开启。

日本战国是当之无愧的超级乱世：将军或被人打上门去砍作肉泥，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天皇贵族也完全被天下人无视；而一个来历众所纷纭之人却可使尽阴谋诡计荣登国主之位（如北条早云），横行无忌大杀

四方；连农民也可自发组织“一揆”，夺地自治，目无尊贵。其间兄弟同族背叛、父母子女相残之事，不可尽数。烽烟杀戮不绝，竟长达近两百年。

终结战国乱世的德川家康开始对这个国家的旧有体制进行改造，试图不再依靠皇室、贵族的旧有权威，分封武士层级，使其包揽权力。从战国时代幸存下来的大名，无论是属于德川一派的，还是曾经与德川对抗过的，几乎都得到了新的封地，当然封地存在的原则是以维护幕府统治为前提。全国大名分为三大类，即亲藩（御三家）、谱带和外样。统御面积超过一国领地的称为“国主大名”，这样的大名到江户时代后期有19家。幕府最为信任、倚靠的自然是御三家，即尾张德川家（封地清洲，清洲是名古屋的前身）、纪伊德川家（封地为现在的和歌山县）、水户德川家（封地为现在东京以东的茨城县）。这御三家的藩祖都是家康的亲儿子，代代子孙可为将军候补者，确保幕府将军血统纯正。除御三家外，又有将军庶子一系的御三卿，御三家的庶子分流而出的御连枝等，枝繁叶茂支撑起江户幕府。

在这些风光无限的亲藩以外，其他大名自然是等而下之，其领地所处位置也随着门第的降格而渐渐远离江户。但其中的谱带大名，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藩祖大多是



德川之老根据地三河国的地头家族，以武将身份跟随家康东征西讨、征服天下，立下赫赫功勋。其中的代表便是当年家康手下武功最高的“德川四天王”——井伊直政（继承武田家军法，领导最精锐部队“井伊赤备队”）之井伊家彦根藩、本多忠胜（曾被丰臣秀吉誉为日本第一勇士）之本多家乡崎藩、酒井忠次（四天王中的“笔头”，即最高位者）之酒井家庄内藩（另一分支在姬路藩）、榊原康政（小牧长久手合战之头号功臣）之榊原家高田藩。谱带大名的领地并不宽广，且地形险要，会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动，不断进行转封。

最后是位居下层的外样大名。他们在幕末蜂起打破幕藩制度，是开创明治新时代的主力。如果不是在幕藩体制中屈居外样这一下层地位，其造反动力显然不会那么足。对德川家来说，这些在秀吉死后才归顺于帐

下，甚至直接在关原战场上作为西军与其进行对抗的大名，尽管战败后不得不归顺，但其忠诚度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江户幕府前三代将军持续采取举措，将外样大名不断往边缘角落地区转封，而又令这些外样大名前来江户参勤交代，等于是做定期人质。而这漫漫参勤之路便是耗时耗钱的一大麻烦事。

除此之外，外样大名又承担了大量“普请”劳役，出钱出力为幕府修筑城池、道路，疏浚河流等。总之一句话，既被防范又被敲诈。虽然心中不忿，但祖上势力最强盛时都败阵下来，作为子孙又能如何呢？传说毛利家长州藩每年举行新年仪式时，都要由家臣装模作样地向藩主问一句：“今年可否倒幕？”藩主则例行公事地回答：“时机未到。”此类反对德川幕府的情绪，即使经历了二百余年盛世，也仍在所待遇最差的一些外样藩内代代相传了下来。

武士之忠诚

18世纪初，和平盛世中的日本江户发生了一起轰动性事件。1701年初，浅野家赤穗藩（即今兵库县赤穗市）的藩主浅野长矩，作为一位拥有五万三千石领地、官居从五品下的外样大名，被幕府指派接待天皇敕使的

工作。他对具体指导接待工作的吉良义央深感不满，于3月14日在江户城内公馆的松之廊下，忿然拔刀砍伤了吉良。幕府经过快速审理之后，便令长矩切腹自尽，没收赤穗藩的领地，却没有追究吉良在这一事件中的

◎ 大名参勤交代队列的绘画。图中，大名坐于“乘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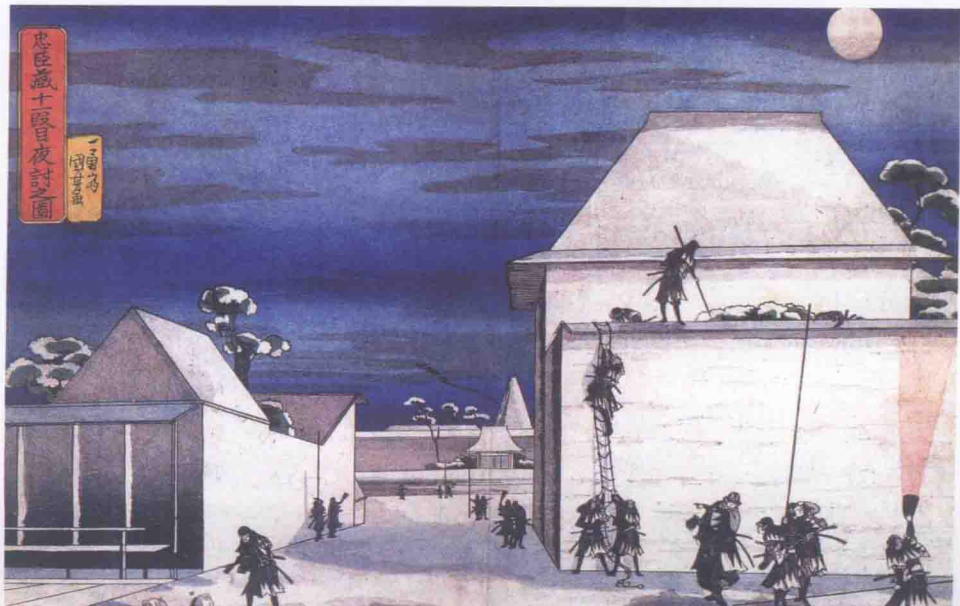
任何责任。消息传回赤穗藩，三百余名藩士尽管群情激奋，但在幕府军队的威胁下，被迫变卖藩内财产，领取补偿金后被遣散。家老大石良雄召集没有离开的一百二十余名藩士立下复藩血誓，结成所谓的“赤穗浪士团”。

次年年终，幕府正式拒绝复藩请求，于是响应号召的的四十七名浪士在大石良雄的率领下，于12月15日晚踏雪袭击了吉良宅邸，将其杀死，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挑着仇敌头颅自首。除了一名“证言人”走脱以外，四十六名义士被幕府禁闭一年多后，全部切腹自尽。这就是“赤穗事件”，又称“忠臣藏”，是这个国家用所有艺术形式反复演绎了无数遍的悲壮故事。然而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四十七义士”以复仇为名明目张胆地袭杀幕府高级官员（早有明令禁止武报私仇），而幕府却没有禁止这个故事流传

于全国每一个角落，“四十七义士”被赞颂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这是为何呢？

深入这个所谓的“日本男子汉终极美学浪漫”的故事表皮之下，其实可以挖掘出幕藩体制及江户武士的实态。德川家康当年灭亡丰臣家，初定天下时，便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以法律形式约束大名与武士。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对此法度进行改订，诸如参勤交代定制、禁止建造载重五百石以上大船以强化锁国海禁等都得到确立，后世不再进行大的改订。按法度规定，五万石领地级别的赤穗藩应配备百名以下的藩士，然而藩内事实上却养着三百多名藩士。对于不遵规定的赤穗藩，幕府其实早有意予以打击，所以在“松之廊下刀砍事件”发生后便迅速做出裁决，却不料因行事不公引发了后续的复仇事件，致其在社会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幕藩体制下，幕府与大名之间，

◎ 忠臣藏十一段目夜讨之图（歌川国芳绘），描绘的是四十七义士袭击吉良宅邸的情形





◎ 江户城地图

实是封主与封臣之间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的关系，而非封建官僚体系中的皇上与奴才的关系。

总而言之，大名藩国具有半独立自主权，并不是说灭就能灭的。再看执行这次“义举”的浪士们，与其说精神上极度义愤促成他们断然拼死，不如说是灭藩之后生活全无着落，迫其舍命抗争。其中一名义士年仅17岁，靠谎言才拿回早已典当出去的甲冑参加行动。领导者大石死后留下的账簿，反映出这些浪士们都是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复仇行动尽管违反了幕府法规，却只是枝节问题，连幕府也必须赞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浪人认定不能离开旧藩而独活！如果

所有武士都如此忠诚于他们的家主，所有的藩国岂不都稳如磐石？而德川家控制着最强大、占地最佳的藩国，外样大名的造反自然不可能成功，如此幕藩体制不也就千秋万代，屹立不倒了么？

德川家不会预见到，有朝一日西洋人会带着先进的枪炮军舰而来，直接撞开江户的大门。他们完全不能设想，未来的战争中武士军队将无法压倒百姓武装，只因后者能更熟练地使用西洋武器。在他们的眼前，江户是一个真切的盛世，江户城的城下町从荒泽发展成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级都市。普通“町民”虽说日常生活艰辛，却在闲暇之余，人人可享受澡堂（钱汤）、

流动快餐（一膳屋）、戏曲（歌舞伎净琉璃等）、外出旅游（宿屋）、看新闻漫画（绘草本等）……可见町人文化极度繁荣。

无论多么具有尚武精神的武士，也不论幕府如何强调其社会地位和行为准则，要抵御世间如此多诱惑，真的太难！武士“堕落”例子之多随手就可拈来：高田藩藩祖乃“德川四天王”之一榊原康政，而他的后代榊原政岑却成了吉原游郭中的头号游主，用数千两黄金为“高尾太夫”（身价最高的妓女“花

魁”称号）赎身，还发动大批妓女在街上游行，举办豪华宴会，奢侈放荡轰动天下，最终被幕府判决退位隐居；德岛藩（今德岛县，古阿波国）家臣蜂须贺直孝（其祖先是蜂须贺正胜的手下大将）更是奇怪，狂热喜好当地一种挥手踏足、滑稽万分的阿波舞，以至于被当成脑子有问题而被关起来，可只要一恢复自由身，他就奔出去和平民混在一起，舞蹈不休。如此“武士”，在江户盛世中又何止千万？

国防之策

1636年，江户幕府在九州长崎港入口处人工填出一个小岛——出岛，设为荷兰人聚集区。荷兰人不信奉天主教，只顾经商赚钱，当时荷兰的流行语是：一个人最大的恶行不是冒渎上帝，而是欠债不还。因此幕府认为与其接触危险性较小。出岛是江户时代日本与欧洲人交流的唯一合法窗口（对朝鲜交流通过对马藩口岸及草梁倭馆，而1609年被征服的琉球王国则由萨摩藩管理，并隐瞒明清皇帝派遣的使者）。

出岛设置有长崎奉行的管理机关和荷兰人的住宅、仓库，用石墙和土墙围绕起来，只有一座桥和市区相连。由荷属东印度派遣而来的商船通常一年两艘，每次能登上岛的也只有十人左右。即使是日籍工匠、搬运工要出入时，亦须持有出岛官员发行的“门鉴”。在出岛以外，如果有遭遇海难，偶尔漂流至日本海岸线的外国人，首先要识别其是否是天主教徒——不肯踩踏耶稣

像的外国人往往被当场杀死——若非天主教徒才加以救助，送往长崎，搭便船离开。对漂流民的处置，与各沿海藩的警备体制相互配合，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杜绝了外国人擅自深入日本腹地的一切希望。

◎ 在出岛瞭望台上张望商船入港的荷兰人，可见其身后有背着“洋囡囡”的日本妇女。由于需要长期生活在出岛，不少荷兰人娶了日本女人，但生下的孩子被禁止追随父亲前往海外，只能作为“怪模怪样的日本人”度过一生



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日本越加稳固的同时，亚洲大陆上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满清突然崛起，入主中原，明朝于公元1644年崩溃了！镇压了国内天主教徒（并附带处死了一批西洋传教士）的幕府，与其说担心欧洲殖民者报复的炮舰，不如说更担心满清和元朝一样，跨海东侵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思想家熊泽藩山（1619—1691年）声称：“北狄取中国，则时时可来日本也。”因此幕府对中国大陆发生的情况格外关注，凡是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船民，均受到仔细询问，以此收集大量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疑虑，日本见清朝当权者并无东进之意，便又飘飘然起来，认为是日本武士吓阻了八旗兵。兵学家山鹿素行竟声称：“本朝之武勇令异国恐惧，不但终无外国进攻本朝，亦无寸土为彼所夺之事。故武器、马具、剑戟之制，兵法、军法、战略种种，非彼国所及，岂非武勇优于四海耶？”

经历丰臣侵朝战争惨败的日本人何以保持如此满溢的自信？只因战国时代以来，陆续乘船来此的西洋人确实让日本人开了眼界。1579年，日本天主教耶稣会负责者葡萄牙人范礼安（A.Valignano）与九州基督教大名大友宗麟合作，派遣天正遣使团（团员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访问欧洲，拜见罗马教皇。1613年，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派遣的庆长使节团，更是乘坐500吨级的西班牙式大帆船桑帆号（由西班牙人指导建造），向西跨越太平洋至美洲墨西哥，



位于茨城县水户市千波公园的德川光圀雕像

再渡大西洋至欧洲游历。这两支使团回国时，都恰逢日本掀起排斥基督教运动，使得这些见识非凡的团员无法施展抱负。但毕竟日本对整个世界已经持有基本认识，而西洋人诸如“这个国家的人是我迄今发现的国家中最高级的，比日本人更优秀的民族在异教徒中恐怕找不到”（首位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沙勿略语）之类的评语，使日本

人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拿来与中国、朝鲜一起评价，而且还胜出了！其洋洋自得自是理所当然。在日文版的“亚细亚洲”地图上，日本人首次将本国国名标为——大日本。水户德川家的一代明君德川光圀，设立彰考馆编撰鸿篇巨制《大日本史》，经250年岁月才在1906年正式完成402卷的恢弘伟业。其书遵循朱子学史观，尊“万世一系”天皇皇统，由此形成的所谓“水户学”，将对幕末尊皇论思想，以至于“大日本帝国”的最终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历数次大规模迫害天主教浪潮（以“岛原天草之乱”于1638年遭幕府军血腥镇压为标志）的日本，在出岛口岸成功设置、沿海警备体制确立之后，正式进入锁国状态。在当时东亚范围内，清朝与朝鲜等同样锁国，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西方殖民者的步伐越来越快，已将远至东南亚的广大区域占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所需的财富与原料，进行残忍的殖民掠夺。他们所带来的完全异样的技术、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以及更加令人骇异的“吉利支丹”